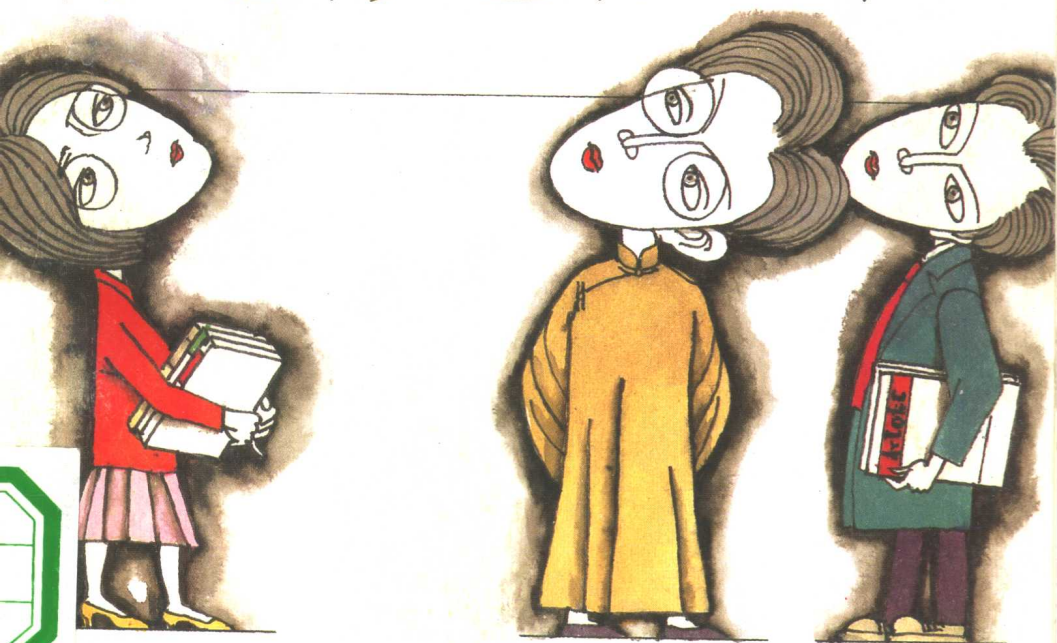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随笔》
精粹

黄伟经
谢日新 编

臭老九 酸老九 香老九



《随笔》精粹

九 老 臭
九 老 酸
九 老 香

黄伟经 谢林辉 编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臭老九 酸老九 香老九

《随笔》精粹

黄伟经 谢日新 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清远华星电脑激光照排

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125 印张 1 插面 350,000 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300 册

ISBN7-5360-1669-7/I·1473

定价: 13.00 元

序

黄伟经

我乐于参与编《随笔》作品选，并为它的出版说些话。

这是《随笔》创办迄今所发表文章的第一个选本。入选作品五十九篇，选自该刊从80年代初至1992年底各期，即从它十多年来所载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文章中精选而成。《随笔》是一个面向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的散文刊物。现选入的五十九篇散文所记述的，非一般“老九”，而是我国当代在文坛上或文化学术研究上卓有成就，甚至蜚声中外的一部分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学者、专家。如马寅初、朱光潜、俞平伯、冰心、沈从文、巴金、吴宓、钱钟书、王瑶、聂绀弩、吴晗、马思聪、胡风、徐铸成、沈尹默、陈达、杨绛、董每戡、阿垅、张友鸾、萧军、梁宗岱、曹靖华、陈学昭、邵荃麟、肖也牧、路翎、杨逵、萧乾、廖冰兄、钟惦斐、杨刚、胡山源、赵丹、孙犁、杨沫、林海音、公骥、陶白（东方既白）、黄秋耘、流沙河、黄永玉等。其中一些很有成就、很有影响、很有威望的大学者、大作家和大思想家，堪称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，中国人的人格、智慧和良知的优秀代表，文学、文化学术界真正的“国宝”。

深以为幸和感到欣慰的是，我与《随笔》同仁首先充当了这批入选作品发表时的读者和编者。所选作品，除少数几篇是夫子自道之外，作者若不是所写对象的亲人、老友，就是其同事、同窗或学子、研究者等。它们最明显、最可贵的特色就是：真实。即

讲真话；没有杜撰编造，也没有谎言妄语。其中若干篇章，经过时间、实践的检验，也许可以较长久地保留其美学与历史的价值，成为可资后人研究的参考史料。

爱国爱民，忧国忧民，热爱、维护真理和对真理的探索与执著追求，这是五四以降我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格和精神特征。这种人格和精神特征，在本书入选文章中，都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窥见到，感受到。书内写到的四十多位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学者、专家，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受过各种曲折、坎坷、磨练、考验、不幸、痛苦和灾难，一些人还为此祸连亲朋好友，乃至付出人亡家破的沉重代价。他们种种令人可感可叹、可悲可怵，甚至惨烈至深、动魄惊心的经历，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历史的一部分，给我们以启示、警策和激励。

富于思想与独立思考，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学者、专家的一大特长。有思想，有独立思考，才有创造发明，社会和民族才能不断发展、进步。若以言获罪，就必然思考废弃，思维僵枯，文化萎缩，社会停滞甚至倒退。本书所写的那些著名作家、学者的许多往事，无不说明：当一个作家、学者每说一句话、每写一个字，都心有所悸，要想想是否会为此得咎而遭受批判甚至缙继之冤时，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求也就差不多终结。往事历历，记忆犹存。个中的种种教训，似乎还有待我们去消化和汲取。

历史不会忘却，也不应该忘却。

这个选集的汇编出版，大概有助于读者记住过去，回顾和咀嚼过去，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、更坚定地迈向未来。

1993年初秋写于广州

目 次

中国“布鲁诺”的悲剧	刘发清 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——缅怀马寅初校长

忆朱光潜先生	戴镛龄 (10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俞平伯二三事	张白山 (15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俞平老的“书生气”	朱 寨 (1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我心灵深处的冰心	方小宁 (24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默默者存	魏荒弩 (29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——沈从文先生和我

与巴金谈沈从文	李 辉 (3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真挚的心和为还债的书	王西彦 (46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忆吴宓先生	郑朝宗 (60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记钱钟书先生	吴忠匡 (66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怀旧	郑朝宗 (79)
----------	----------

续怀旧	郑朝宗 (88)
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我所浅知的钱钟书先生点滴	舒 展 (9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瑶华圣土	徐葆耕 (10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——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

悼念之余	梅 志 (11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——忆聂老绀弩

“赢输原不定，对弈两三场”	顾学颀 (122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——忆聂绀弩二三事

哀吴晗	严 秀 (129)
——他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	
希望在人间	柯 灵 (134)
——马瑞雪《马思聪蒙难记》序	
遍插茱萸少一人	冯英子 (139)
——敬悼徐铸成先生	
重逢第二篇：胡风	牛 汉 (146)
艺术的磨练和劫难	徐开垒 (156)
——追怀沈尹默老人	
枯柏重青	黄伟经 (162)
——忆社会学家陈达教授	
杨绛先生素描	舒 展 (169)
记杨绛先生	董衡巽 (175)
秦灰鼠啮更辛勤	顾学颀 (182)
——记古典戏剧评论家董每戡	
忆阿垅	何剑熏 (189)
蓝色的勿忘我花	苏 予 (195)
没字碑寻白雪篇	张 钰 (213)
萧军印象	贾植芳 (222)
忆田家英	黎 澍 (227)
忆梁宗岱先生	戴镛龄 (231)
怀念曹靖华先生	魏荒弩 (237)
桂花成实向秋荣	陈亚男 (243)
——记我妈妈陈学昭	
邵荃麟最后的日子	黄秋耘 (251)
忆肖也牧	秦兆阳 (255)

重逢第一篇：路翎	牛 汉 (261)
相交五十年 相见在九泉	晓 风 (267)
陆定一大难不死	胡思升 (272)
忆萧珊	萧 荻 (277)
关于萧乾的点滴	严文井 (286)
八十自省	萧 乾 (293)
——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态	
我心目中的爸爸廖冰兄	廖陵儿 (300)
那一缕难得的阳光	罗 惠 (333)
——悼念钟惦棐同志	
我所认识的山源老人	徐华根 (337)
想起了杨刚	刘炳善 (344)
柳州红楼话赵丹	傅 真 (350)
甘苦心自知	段 华 (354)
——关于孙犁	
老师·朋友·“场外指导”	龙世辉 (361)
似曾相识阮玲玉	徐 然 (369)
——虎年的母亲杨沫	
林海音探亲	文洁若 (374)
延安培养的第一位教授	丁 耶 (382)
风雨琐记	东方既白 (388)
荒原上的“狼群”	黄秋耘 (396)
——五七干校生活杂记	
流沙河的书斋生活	曾伯炎 (404)
画意诗情	邹荻帆 (411)
——断篇记永玉	

作家的书简与友谊	王 蒙 (418)
怕	赵曙光 (421)
“贫民窟”的男人和女人	包 谷 (427)
“新老九”搵食录	韩 强 (433)

中国“布鲁诺”的悲剧

——缅怀马寅初校长

刘发清

1958年春天，北京天气晦暗，寒风逼人。风风雨雨中的未名湖溅起点点水花，宝塔模糊的影子在湖中不停地摇晃、颤动。燕园行人不多，间有过者，个个脸色严峻、行色匆匆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雨水冲刷得七零八落。附近教室不时传来斗争“右派”的怒吼声。北大，作为“右派”猖狂进攻的“最大据点”，“右派”数量之多，“质量”之高，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首屈一指，因而率先受到最严厉的惩罚：1957年七、八月已经揪出第一批学生“右派分子一二百名”；十、十一月又扫荡出一大批。如今进行声势浩大的第三次歼灭战——要把一切暗藏的“右派”统统挖出来。因为这批人数最多，“隐藏最深”，也“最狡猾”，所以斗争更为残酷。有的“右派”跳了楼，有的服毒自杀。在第二批揪“右派”时，团支部书记已正式宣布为“中右”的我，此次也被“深挖”出来了，“提升”为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人民的“右派分子”。

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，我班召开批判斗争我和另一个“右派”同学的大会。也许“右派”太多，也许我们这等小“右派”不够资格，或二者兼而有之，斗争会没有礼堂，也不在教室，而是在我们学生宿舍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。这个约有15平方米的小房间，进门左侧摆有一张双层木床，紧挨右墙连着两张双层木床。六张小书桌被挪到室外。靠里面窗户处腾出一块三四平方米的地方。我们班有27位同学。有几位早已当了“右派”，取消了参加

会议的资格；另几位有“右派”之嫌，写检查去了。因此出席者不到 20 人。三张床的上、下铺坐满了人。房里显得更拥挤和狭窄了。会议主持人也只得委屈地坐在下铺上。他命令我们两个“右派”低头站在窗户边。

8 时正，会议正式开始。会议主席声色俱厉地宣布：我们班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，今天又揪出两个“右派分子”，他念出黄××和我的名字。接着，有人领头呼口号，他喊一句，大家跟一句：

“打倒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黄××！”

“打倒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刘××！”

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在小房间里回荡。主持人说：现在首先批判右派分子黄××。话音刚落，事先早已布置准备好发言的同学急着举手，正在这沉默的空隙间，房门突然响起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。

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。

“哎哟！马校长参加我们的批判会来了！”

“欢迎马校长光临指导！”室内骚动起来。会议进程被暂时打断了。气氛顿时为之一变，响起热烈的鼓掌声……

趁没有人注意之时，我急忙抬起头，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：马寅初身穿一身灰色毛哔叽中山服，身体肥硕，四方脸庞。额门高阔，两道浓眉下闪烁着光辉……他含笑向大家点点头，脱下深蓝色大衣，转身交给跟随在后面的一位青年人。有人急忙找了一张板凳，放在窗户之下，又搬了一张小书桌摆在前面。马寅初背着窗子坐着。我两个被指定挪站在靠右边的床前。有人坚持请马校长作指导。他却摇了摇头，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说：“兄弟今天听诸位发言，向大家学习，不是打扰会议、麻烦同学来的。”

马寅初执意不说。会议照常进行。

虽然，我对自己当“右派”，挨斗争，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。

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马校长突然来到，却大大加重了我的恐惧感：我仿佛等待宰割的羔羊，有如雷击似的惊慌，心中发抖，浑身发冷，无地自容的羞耻感和无边的痛苦穿透骨髓，吞没了全身每一个细胞。倘若此时地下能够突然裂开一个吃人的血盆大口，我将毫不犹豫地跳进去……我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被押赴刑场似的一种感觉；所不同者，我的手没有被背绑起来，背项没有被插上在我的名字上打有“√”符号的标志……但，过了不久，我的大脑神经好像完全麻木起来，有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的孤独感，所有希冀、所有抱负、所有光明都被彻底粉碎了，心中只留下一堆灰烬和死寂……

斗争会仿佛由于马校长的来到而火上加油，发言相当激烈，用词无不用其极。我脑子膨胀起来，像塞满垃圾，耳边乱哄哄，分辨不清哪些人发言，听不清说些什么。但我知道他们批斗黄××。主要“罪行”，是实习期间在某省报社鸣放座谈会上发言，主张办“同仁刊物”；而我的“罪行”，主要是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有怀疑的言论和行动（在一张题为《胡风是不是反革命》的大字报上签了名）。因为我暂时处于“陪斗”地位，不知出自好奇，还是由于某种特殊吸引力，我垂下的眼睛偷偷地睨视了近在咫尺的马寅初。我看见了他头上稀疏的白发，紫铜色脸上的皱纹和松弛肌肉上的不少褐色的老人斑。他双手放在小书桌上，半眯着眼仔细倾听着每一个人发言。他目光深邃专注，脸部毫无表情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的神色。后来，他仿佛变成一尊大理石雕像，一动不动，好像沉思，又好像闭着眼睛睡着了，自始至终没有说话。

斗争会足足开了两个钟头。结束时，会议主持人热情地“请马校长讲话”。一阵热烈鼓掌，仿佛使老人从梦中惊醒，他睁开眼睛说：“兄弟到处随便听听，原没有准备讲话，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说。”休息时间到了，马寅初站起来，拱起双手，说：“诸位，再见！再见！”他走出了房门，背后又响起一阵热烈掌声……

稍事休息，接着斗我。由于马校长走了再没有回来，我似乎反而轻松起来，仿佛搬开了压在心上的一块巨石，心情平静多了……但马寅初为什么要参加我们的斗争会？他为什么不讲话？在整个反右斗争期间，作为全国反右重点的北大校长，他为什么没有作过一场反右斗争的报告？为什么除了在《文汇报》写过一篇关于“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”的文章以外，他似乎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批判“右派”的文章？把这些迹象联系起来，岂不令人深思和费解？然而，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马校长了。

作为留校学习、改造的“右派”，除了挨斗会，几乎不准参加任何会议。然而，1958年7月×日举行的全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却让我们参加了。会场设在古柏参天的天坛公园之内。这天上午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数千名即将奔赴祖国四方八面的大学毕业生，满怀着金色希望，容光焕发，神采飞扬，在距蓝色琉璃瓦房顶的祈年殿不远，倾听前北京市某领导人的重要讲话。他站在台上，通过扩音器的大喇叭，向我们描绘了祖国未来乐观图景——美满幸福的锦绣前程：我国虽然一穷二白，但除有党的领导之外，人多是一个条件。特别是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以后，全国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。在钢铁、粮食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指标方面，我们准备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，赶上美国。我们的伟大国家将很快富强起来。“但，有人不是这样看的，”他声调忽然一变，语气严峻地说，“有人认为人多不好，是坏事。英国反动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‘人口论’就这样讲的。而马克思主义的‘人口论’，则完全相反……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也有‘团团转’的‘人口论’。马克思是马家，马尔萨斯也是马家，马寅初先生姓马，但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‘马家’，还是姓马尔萨斯的‘马家’呢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原来会场开会时所特有的一种“嗡嗡声”——有如许多蜜蜂在巢内的振翼声音，此时突然消失了，气氛严肃紧

张，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，只听见尖叫刺耳的蝉鸣和风吹树叶的簌簌声……然而过了片刻，“嗡嗡声”突然以加倍力量震动起来……我的一个“右派”同学把嘴巴搭在我的耳朵上，带着忧郁的语调悄悄地说：“我们的马校长也完蛋啦！”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。

实际上，自大鸣大放以来，北大师生都担心马校长的命运。马寅初在北大有崇高威信，牵动着广大师生的心。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外知名的大学者，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为人刚直不阿、不畏权贵。马老于清末到美国留学，先后获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“双料”博士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财政学专家赛利格曼教授对他非常赏识。他的博士论文在纽约出版，被该校选为大学一年级教材。回国以后，他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大经济学教授。抗日战争期间，马寅初是非常著名的“骂人”学者。他不骂佣人，不骂老百姓，专骂“大头”。他到处发表演说，写文章，大骂国民党贪污腐化、祸国殃民；痛斥四大家族发国难财：“中国的几户‘大贪污’其误国之罪，远在奸商汉奸之上……”老蒋挨骂，心如火燎，特地派人找马寅初“谈话”；但他不仅不去，而且傲然说：“将委员长要我去见他，他为什么不可以来见我呢？”蒋介石无可奈何，使出另外一招：声称要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或中央银行行长。同样遭到马寅初的严词拒绝。于是1940年12月6日，马寅初被宪兵逮捕，曾先后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和上饶集中营。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和三年软禁的痛苦折磨，马寅初坚贞不屈，始终不低头“认罪”。正如他在狱中度过60寿辰时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的祝寿贺联所说：“不屈不淫征气性，敢怒敢言见精神。”

解放初，“无党派民主人士”马寅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。1951年调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后，年逾七秩的马寅初不辞劳苦，三下浙

江作人口调查。“旧时代浙江分成 11 个府，我跑了 10 个。”1954 年他一次就跑了 10 个县级的 20 个农业合作社，详细调查每个村一年生若干，死若干，生死相抵，增长若干。经过连续三年反复缜密的实际调查研究，马老发现我国当时人口增长率，每年高达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，每年净增人口 1300 万人以上。相当于当时七个阿尔巴尼亚或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口的总和。啊！增长率实在太高了。倘不加以控制，必将产生“人口危机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1957 年春天，正当燕园柳丝吐绿、桃花照人的时刻，4 月 27 日，我与几千名师生挤在大饭厅，怀着极浓兴趣，聆听了马校长关于“新人口论”的讲演。76 岁高龄的马老神采奕奕，时而比着手势，时而竖起两道浓眉，用洪亮嗓音侃侃而谈：要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起来，必须解决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，解决之关键，必须从发展科学和节制生育两方面入手。他引用大量具体、确凿的数字和事实，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。照此下去，根据他的计算，再过 50 年，中国就将有 26 亿人。因此必须坚持实行“节制生育”（他从不使用“计划生育”这个两可概念）。他主张每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胎，对超生者必须严格实行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等有效节育措施……他还把自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——即《新人口论》交 1957 年 7 月 5 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他高瞻远瞩、忧心忡忡地向人们敲警钟：“控制人口，实属刻不容缓，不然的话，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，愈难解决……”倘政府对此问题不予重视，“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。”此外，他还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等报刊发表不少同样观点的文章。

当时全国人都像喝了“迷魂汤”似的，迷醉于“人多议论多，热气高，干劲大”，“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”的时候，马寅初却以正直学者的良心、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清醒、睿智的科学头脑，独

自一人顶风而上，大唱反调，大胆讲出人口过多的危害，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，企图力挽狂澜——引起全国人民注意。于是，一场历史悲剧上演了——围剿马寅初的战斗打响了。其实，在“反右派”开始后，报刊上已经屡次对他点名地进行批判。1958年下半年掀起第一次批马寅初的“反动的”《新人口论》高潮。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。《光明日报》开辟了批判专栏。这些文章层层加码，调门愈唱愈高，帽子愈扣愈大，形成全国性讨伐马寅初的运动。马寅初真是四面楚歌啊！

1958年9月，我离开了北大，被发配到遥远的大西北。但留在北京的同学却不断从信中给我传来关于马校长的命运的消息：他没有立即离开北大。但到1959年下半年，北大掀起了第二次围攻浪潮，雪片似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，一直贴到马寅初的住宅——燕南园63号。认定他“借学术为名，搞右派进攻”，“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来批判马寅初”。年近耄耋的老人还被强迫拉来作“面对面”的批判斗争，并剥夺他的申辩权利……当马老陷入重围之际，有些好心人劝他立即退却。他们说：凭马老在国内外的巨大威信和影响，只要公开作个检查，可以容易过关。不然的话，恐怕……然而抱定愿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老人不但不听劝告，反而在《新建设》1960年第一期发表《重申我的要求》。在这篇铿锵作响、掷地有声的战斗檄文中，他庄严宣布：“我虽然年近八十，明知寡不敌众，自当单身匹马，出来应战，直到战死为止，决不向专以力压服、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。”读到这段文字，我心中酸楚，热泪盈眶。我仿佛看见一个须发皆白的八旬老翁，为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，孑然一身，扛起沉重的长矛，奔赴必死的疆场。比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场面更为悲壮，更为惊心动魄，更为令人敬佩。马寅初在文章中郑重声明：“在研究工作中，没有把握，不要乱写文章。既写之后，就承担责任，错了勇于改正，是真理要坚持，即于个人有所不利，应该担

当一切后果！”马寅初敢作敢为，像一把火炬，又像一泓清泉，既照出自己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，也照出那些居心叵测的打手们的丑恶灵魂。为了捍卫真理不可污，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，捍卫自身人格尊严和出于相信未来属于自己的坚强信念，他斩钉截铁地发誓：不怕孤立，不怕坐牢，不怕下油锅，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因此，1960年他被撤销北大校长职务，被迫从燕园搬出。他的名字从此从中国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……

历史终究不是任人随意捏弄的面团。20年以后，1979年7月16日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本善到东总部胡同拜访马寅初，传达党中央的意见：“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。实践证明，您的节制生育的‘新人口论’是正确的，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。”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。1979年马寅初的《新人口论》出版，马寅初的冤案由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得到平反昭雪。但此时他已经98岁，下肢瘫痪，说话语言发生障碍……

马寅初的悲剧是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悲剧典型之一。他对科学直理的执著追求和不惜为之走上祭坛的道路，使我想起16世纪伟大哲人布鲁诺。布鲁诺因宣传科学的“日心说”而被罗马教皇逮捕，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备受折磨。当他被判处火刑，押赶刑场慷慨就义之时，他怒声高喊道：“火不能把我征服，未来世界会了解我，知道我的价值。”世界毕竟到了20世纪，马寅初虽然没有被处于“火刑”，但他喊出了布鲁诺一样勇敢坚强的声音，作出了布鲁诺一般的伟大壮举，表现了布鲁诺同样的伟大献身精神。还有谁可以比怀抱连城之璧欲献给君王，被认为欺骗，而先后被砍去双脚的卞和更加悲惨的遭遇呢？对于一个学者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自己拥有真理，却被诬为“异端邪说”，把香花视为毒草，并加以无情践踏而更令人痛心呢？个人的过错，可以改正；但历史过错却无法弥补。马寅初的名誉可以恢复，可是“批倒一个，误